

新阶段安徽农民创业出路

——基于农民工返乡潮背景下的探索

郝敬胜 (安徽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安徽合肥 230051)

摘要 2008年经济危机寒流之下民工返乡潮不期而至。对农民返乡的原因进行了理性分析,并提出新阶段安徽农民的就业出路对策,以促进安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 返乡潮;原因;必然性;偶然性;对策

中图分类号 F3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09)15-07217-02

Discussion on Anhui Peasant Way in New Stage

HAO Jing she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Institute Administration, Hefei, Anhui 230051)

Abstract The civilian worker returned to the township tide to come by chance under the cold current of economic crisis in 2008. The reasons for peasant home were analyzed rationally, putting forward employment countermeasure of Anhui peasant in new stage in order to improve rapid development of Anhui economy.

Key words Return to the township tide; Reason; Certainty; Contingency; Countermeasure

1 寒流奇袭农民工

2008年以来,受金融海啸影响,沿海发达地区企业首当其冲,造成历史上未有过的严峻寒流,大量沿海地区农民工不得不纷纷提前返乡。10月30日,东莞市合俊玩具厂和俊领玩具厂“倒闭”,近6500名员工失业。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仅10月上旬,珠三角就有近50家香港企业申请破产清算。10月下旬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陆续有制造业企业倒闭。11月27日《东方今报》报道:“据河南省劳动部门统计,近期河南籍农民工回流明显增多,目前平均每天从省外返乡的有6万人左右,并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安徽省是全国劳务输出最大的省份之一,其中90%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1],春节之后电视新闻报道仅合肥3县就有50万农民工返乡。《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3月2日《两千万民工失业返乡近年罕见成各级政府新挑战》^[2]。

12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指出:当前“相当数量的农民工开始集中返乡,给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新情况和新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政府将百倍重视,不可掉以轻心。”

2 农民返乡原因理性分析

(1) 历史原因。费孝通先生认为,由于城市缺少吸纳大量劳动力的现代工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只能依附在土地上,谋取边际效应递减的农业生产剩余^[3]。新中国成立后,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国家发展战略中,资本密集型企业对大量劳动力是自然排斥的,严格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进一步将农民限制在农村。

改革开放后,随着外资涌入、政府政策逐步放开,劳动密集型企业东南沿海地区开始蓬勃发展,需要大量简单劳动力的这类企业,为中国7亿廉价劳动力的农民提供了进城务工的契机。

(2) 现实原因。农民工返乡潮出现,并不仅是全球金融

危机的产物。从20世纪80年代农民工开始外出,到今天回归,这是一个历史的轮回。当年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和如今大量农民迟早返乡都具有必然性,至于何时以什么形式什么规模什么速度返乡,则是带有偶然性的。

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后,沿海地区主要采取“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30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并没出现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的那状况——使农民有效减少到10%。相反,据2008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表明,2006年末,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5.3亿人^[4],乡村人口实际上在当初7亿的基础上有所增加。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3000美元,为什么还有60%的农民呢?一是农村生育率高;二是中国开始发展制造业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加入低端制造业,作为产业链中端的全球制造业已经形势逆转,供过于求,打工不能使农民工群体真正富裕起来,更不可能使这个群体全体转化为市民。

(3) 发展方面原因。北、天、沪以及沿海发达地区在技术、资本、管理、经验等诸多方面,实际已经接近许多欧美国家的发展水平,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升级势在必行,参与全球工业化梯度转移占据国外资源、市场也必然会成为一个明智举措。这样,即使将来中国走出经济危机困境,大量农民工再想凭借简单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条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市对民工的需求门槛提高了,势必要阻止很大一部分农民工返回原先岗位,“打工经济”如何转变成“创业经济”成为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综合上述原因,笔者认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简单模式状态下的农民出省打工时代已经划了一个终结,农民问题已经迎来了一个新阶段,具有了鲜明的新的特点:简单劳动需求已经逐渐萎缩;老一代农民工逐渐被会有文化的年轻一代农民逐渐取代,但是新一代农民出去打工成潮的状态规模要减小;农民围绕土地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逐步向城市化迈进;在社会保障扩大后,新一代农民“养儿防老”观念应该逐渐淘汰。这个阶段中国的农民要考虑新出路,必须有一个长远的战略策略。安抚农民等待度过经济危机再次出山的短期行为模式,应该明智的加以回避。

作者简介 郝敬胜(1963-),男,安徽霍山人,硕士,副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国情研究。

收稿日期 2009-03-23

安徽的农民乃至三农问题,尤其要合理规划、科学统筹、谨慎对待、战略思考。理由主要有2点:第一、安徽是劳务输出大省。作为农业和人口大省,安徽一直是我国农民工劳务输出的几大重要“源头”之一。农民工劳务输出收入已成为促进安徽地域经济发展、加快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据测算,2008年安徽省劳务输出净收入总额约700亿元,务工收入已占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60%以上。2000年,安徽省正式启动了“凤还巢”工程,引导“打工潮”向“创业潮”发展,据统计,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有70余万农民工返乡创业,创办各类企业30余万,吸纳220余万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就地、就近就业。尽管如此,2008年全国大陆各省人均GDP已经浮出水面,排在最后6位的省份中,除安徽以外,西藏、广西、甘肃、云南和贵州均为少数民族,以致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国家应加大对少数民族省份的扶植。而做为东部省份的安徽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需要认真对待,以安徽的优异位置(紧邻长三角,又有长江过境),丰富的资源(煤、电、水利、旅游),应该是发达省份才对(需要从自身找原因)。面对这样的省情现实,安徽,更增加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艰难。第二、安徽也是这次民工潮重创省份之一。王三运省长3月6日说^[5]:全省3100多万农村劳动力中有1165万人外出务工。据统计,年均递增70万人。而2009年春节前全省共有620万农民工返乡。

3 新阶段安徽农民的就业出路对策

(1) 各级政府高度重视,“长中近规划”配套合理统筹安排。当前各级政府固然应该高度重视,倾情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但同时不能仅仅当做经济危机的产物来简单对待,更不能仅仅作为2009年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来简单对待,造成短期行为和短期效应。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农民工安置与解决“三农”问题的协调关系。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一切问题都是发展中不断遇到的新矛盾、新情况、新问题,也必须在科学发展的进程中逐步解决,因此必须要有长远的、科学的战略规划。如果只是把农民工问题解决成一般缓解性安置问题,尤其是依靠突击兴办许多粗放型中小企业来安置,就可能重走老路,造成社会资源再度耗费发展潜力严重受挫的局面,给安徽经济造成难以挽回的倒退。1991年安徽比较盲目地关停并转21000个乡镇企业,造成安徽从1991年至今一直难以腾飞的教训,必须记取。假设当年没有安徽急切关闭2万家企业,那安徽农民当年就可以就地创业。安徽要在坚定不移的贯彻科学发展观重要精神的指引下,必须认真制定出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战略。

(2) 深刻分析,认清形式,寻求战略对策。首先必须借鉴1997年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采取的措施主要是:政府大幅增加投资,增加就业岗位,维持社会稳定;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帮助东南沿海出口企业度过难关。目前,很多人期待在2009年下半年重新走上快速增长轨道,认为全球金融危机一旦过去,外需很快就会恢复并持续增长,东南沿海很快“恢复”活力。

但是这次沿海经济惨遭重创,全球金融海啸只是导火线,实质上是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的必然结果。

笔者赞成李昌平先生的观点: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1997年,正是中国“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旺盛时期,而如今如果中国采取1997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办法,只会增加更多的产能,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危机,搞不好有可能在别国走出低谷时,我们正好走进低谷^[6]。

再者中国发展了30年,已经达到了一定发展水平,与后发国家比较,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资源市场和优惠条件都竞争优势小了,外国资本就可能愿意选择更后发国家。

不仅如此,即使沿海发达城市,也会在产业结构升级后,为了积累财富拓展发展空间,更可能参与全球工业化梯度转移,投入大量资金技术占据国外资源、市场,这样不仅GDP会下降,沿海地区能提供的就业空间也会相应缩小。

(3) 沿海发达地区政府、城市与企业,要多做贡献勇于负责。要从长计议,大力做好社会事业发展,特别是在危机时期做好社会保障,如上海努力挽留安置好农民工,给农民工市民待遇。有挑战就有机遇,这样做其实也对沿海地区今后的民心工程、诚信工程做出新的投入,必将在将来很多农民工会推动沿海发达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乃至房地产业等收入型行业的发展,或许也能推进预防北海经济退潮中“烂尾楼”泡沫阴影再度产生。

(4) 树立找饭碗不如造饭碗的新观念。通过这次返乡潮可以看出,中国农民比例多、基数大,中国大城市吸纳能量不足,大部分农民依赖直接走进城市成为市民的道路,是难奏效的。因此,必须牢固树立三农建设,转化农民工就地创业观念,通过“希望的田野”探索建设新农村模式,村镇合理规划大力扶持好成千上万个科技含量高、节约型、环保型的中小企业平台,从而扎根于农村,生长出农民自己的城镇家园。变农民“打工经济”为“家园经济”,变被动务工为主动创业,从而寻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模式。这里需要几个相关问题要统筹规划:合肥等已有的17个城市,要整合资源挖掘潜力,最大限度妥善安置农民工。据报道: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合肥、芜湖、马鞍山和铜陵等城市曾一度面临用工缺口,而全省用工缺口最高时逼近50万人。借助这批难得的返乡生力军,积极努力延揽人才。大量农民工在外面被培训多年,是安徽劳动资源的一笔巨大财富,他们也带回经验、技术、资金,甚至项目,正好弥补了安徽省企业的“缺工”需求。激活民工创业热情。当年毛泽东主席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所以一定要稳定农民现有土地使用权制度长久不变,这个十分重要,清醒的认识到农民工回乡固然是无奈,但如果没有家里的“一亩三分地”,他们不仅无家可归,更没办法积蓄力量,也将丧失最后的底线保障,社会很难稳定。

从20多年的打工经济中应该认识到打工不是永久出路,自己创业才是农民最终走进富裕的康庄大道,因此必须树立起农民工真正成为创业群体和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的观念,各地政府必须做好服务工作,激发他们的创业和建设热情,在深化改革和发展生产中,推进农民向市民转化等。

(5) 进一步解放思想,把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十七大报告提出要“稳定低生育水平”。改革开放30年来,人口生育方面揭示出总的趋势是:经济发展水

(下转第7227页)

措施,这不仅影响了和谐社会的构建,对整个国家也有着极坏的影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最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与政府沟通、进行利益诉求的最佳途径。

4.2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民的政治参与提供坚实的物质保证 一定的经济基础是农民进行有序政治参与的物质保障,经济状况较好的人政治责任感普遍较高,更倾向于用理性的态度来对待政治参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将为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物质保障。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农民不仅以税收形式向国家提供了资金积累,而且还通过工农业产品不等价的形式向国家和城镇居民提供了隐性资金,从而影响了农民的收益。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的工业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了一定的竞争力,工业反哺农业的时机已成熟。国家适时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对农民种粮进行补贴,采取各种措施增加了农民收入。

4.3 加强教育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新农村建设的改变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现状的一个重要机遇,其建设的重心在农村,主体是农民,应树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主体的意识。要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质量,就要注意培养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新型农民^[9]。新型农民应该熟知自己的合法权利,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通过合法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利益。各级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力度,促进农村教育的发展,通过宣传教育,增强村委会成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的能力,使村委会成员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

4.4 强化基层政府的服务意识,加强对农民政治参与的正确引导 政治参与是农民依法享有的政治权利,基层政府要不断强化服务意识^[10],提高服务水平,对农民政治参与进行

(上接第7218页)

平与女性人口的生育率呈反方向发展。上海经济发达,人口出生已经实现连续16年负增长的喜人现象。

而农村,1990年中国第4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中国女性人口的生育率为2.31。2000年的人口普查争议较大,但是有学界最新调查数据表明中国当时的生育水平仍在1.8左右^[7]。国家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农业户口平均想要子女数为1.78个。中国人口的70%在农村,而目前在大部分省区的计划生育条例中,都有农村独女户可生二胎的规定。据粗略估计,平均每个妇女比城市可多生0.5个孩子^[8]。这致使30年农村人口出生育高速发展,乡村人口有增无减,已经转化为市民的老一代民工的农村位置,被新产生的新一带农民所取代,农民依然占据在60%的高位比例,国家工业化任务难以推进预期成效。中国农民很苦,而农民苦难的一个原因与其自身

合理的引导,帮助农民正确行使权利。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政府要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村各种协会组织的发展,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理顺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不断完善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将分散化的政治意愿整合成农民的集体话语,从而将农民的政治参与纳入制度化、有序化的政治参与轨道上来,最终实现依法参与政治,从而杜绝不合法、不规范的政治参与行为,引导农民政治参与健康、积极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66.
- [2] 王旭宽. 乡村政治关系和谐构建与农民有序政治参与[J]. 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32-36.
- [3] 程同顺. 当前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一个比较政治学分析[J]. 江海学刊,1995(1):39-41.
- [4] 马晓春. 农民政治参与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价值功能与关键点[J]. 求索,2006(11):64-66.
- [5] 陈湘清. 新时期农民政治参与的思考[J].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21-123.
- [6] 吴全周. 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问题与对策分析[J]. 企业家天地下半月刊:理论版,2008(11):29-30.
- [7] 林培成. 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现状及对策探析[J]. 黑河学刊,2008(1):74.
- [8] 田慧武. 关于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的思考[J]. 岭南学刊,2008(3):94.
- [9] 陈鹏.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政治参与调查与思考[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15-16.
- [10] 陈湘清. 新时期农民政治参与的思考[J].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21-123.
- [11] 梁中芳.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决定因素——世界各国发展农村的成功经验与启示[J]. 安徽农业科学,2007,35(31):10102-10103.
- [12] 王红光, 邬家峰. 社会资本视阈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 安徽农业科学,2008,36(23):10222-10224.
- [13] 顾馨梅. 新农村建设中促进苏中地区农民增收的对策研究——以江苏省扬州市为例[J]. 安徽农业科学,2008,36(23):10240-10243.
- [14] 朱晓辉.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思考[J]. 安徽农业科学,2007,35(32):10517,10534.
- [15] 冯燕芳, 陈永平. 新农村建设中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规模化的政策建议[J]. 安徽农业科学,2008,36(24):10700-10701.

生育率高有必然的关联,甚至还造成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参考文献

- [1] 孟银菊, 毛伟, 安雨, 等. 金融危机来袭 安徽部分农民工开始提前返乡[N]. 新安晚报,2008-11-10.
- [2] 汪孝宗. 两千万民工失业返乡近年罕见 成各级政府新挑战[N]. 中国经济周刊,2009-03-02.
- [3] 郭亮. 从农民工“返乡潮”看中国改革基本经验[N]. 长江商报,2008-11-27.
- [4]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 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五号[EB/OL]. (2008-02-27). http://www.stats.gov.cn/tjgb/nytjgb/qgnytcgb/t20080227_402464718.htm
- [5] 曹显钰. 安徽省省长王三运: 倾情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N]. 安徽日报,2009-03-08.
- [6] 李昌平. 中国农民的出路与中国道路[EB/OL]. (2009-03-08) <http://www.cul-studies.com/Article/feni/200903/6032.htm>
- [7] 陈卫. 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到底有多高[EB/OL]. (2007-01-19) http://www.china.com.cn/hog/hog/txt/2007-01/19/content_7682910.htm
- [8] 国务院: 十一五末人口总量控制在13.6亿人[EB/OL]. (2007-01-22) <http://www.1911.cn/bbs/dspbs.asp?BoardID=5&d=51433>.